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亿万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纪元——

新中国走过的路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日子。各民主党派这天联名给中共中央发出贺电,贺电说,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痛快无比的大事……

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毛泽东说了大体相近的一段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与会者的掌声持续了五分多钟。

如果问一个过来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对哪一句话印象最为深刻,大概十有八九会说,是毛泽东说的那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所要完成的一个严峻的历史任务,就是争得国家完全独立和民族彻底解放。于是,人们看到,1949年后,驻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外国武装力量被迫全部撤走,帝国主义列强原来享有的兵营地产、内河航行、海关管理、领事裁判等各种特权都被一一取消。

当时许多人都觉得世道变了。那时候的常用词是“解放”“翻身”“不受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各地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广大人民群众开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什么是“民主”? 1949年8月31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大学问家费孝通的文章,他说自己很早就听说过“民主”两个字,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 并不明

讲述

白。正是在北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看到的场景,让他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民主: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在一个会堂里一起讨论问题,使他第一次对民主的形式和民主的事实有了认识。

中国共产党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共有662名代表,包括各党派、团体、区域以及特邀的代表,还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妇女、自由职业、华侨、宗教等10多个界别的各阶层代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老百姓嘴上的“民主”,在政治上的表达,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和政权机关,前面都加上了“人民”二字,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铁道、人民邮政,包括使用的货币也叫“人民币”。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土地改革,既是为解放贫苦农民,也是为把农村的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彻底完成中国革命最基本的一个历史任务。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搞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定下来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要像苏联那样,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都成为公有制,大家一起按劳分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现实国情不允许这样搞。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让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恢复并经过生产力相当程度的发展以后,再开始采取社会主

义的步骤。

到1952年,国家经济以没有预料到的速度得以全面恢复,社会的经济运行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营经济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于是,在1953年到1956年之间,中国盛行一个政治名词,叫“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工业化,这是目标,是主体;“三改”,就是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被称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背后,蕴含了当时中国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的设想——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改善,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然后进入社会主义。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就是在农村搞农业合作化。1952年,河北省燕山山脉的村落里传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农民。他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1/4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人们就称他们是“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正是靠这3条驴腿,这个初级合作社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量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在1955年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毛泽东当时花很大工夫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目的就是为推进合作化运动,早日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在他编辑这本书的同时,通过1955年的几次会议,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潮。看到几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有人说,“他现在很高兴,甚至比1949年建国的時候还高

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使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到1956年年底,全国已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很顺利。

比较复杂的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采取的办法是搞公私合营,和平赎买。当然,一些经营得还不错的,特别是资产规模比较大的资本家,对搞公私合营,心里难免忐忑和犹豫。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邀请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希望大家能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表示:“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

从1953年到1956年年底,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从那时起,中国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门槛。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1953年第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行的脚步中出现了新的音符。《人民日报》这天的社论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第一个五年计划”。社论还说:“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的确,工业化的景象让人激动,让人感到新奇和自豪。当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时候,从前连铁钉都要进口的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建造的飞机、机床和电子工业。这一年,随着12辆解放牌汽车出厂,一首叫《老司机》的歌曲唱遍大江南北。

1956年秋天,迈进社会主义门槛的

满脸通红。可上车后,苏静一句也没批评他,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身居高位 不谋私利

1960年3月6日,接到养母病重的消息后,苏静连忙从北京赶回家乡。第二天,见到离家多年的儿子后,养母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当时,苏静已被授予中将军衔。不少乡亲们都以,苏静身为将军,他养母的丧事肯定会办得十分隆重,不然“面子”上也过不去。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苏静当着众多亲人的面,将身上仅有的60元钱交到妹妹苏金花手中,要她置办东西,着手料理好养母的后事。

“这点钱要怎么办丧事?”妹妹一脸惊讶。

“怎么不能办?一切从简!”大哥不容置疑。

这是苏静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乡,

中国,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开幕词里说,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俗话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既然是前所未有,那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吧!

在摸索中,中国共产党逐步积累和创造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理论。比如,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张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战略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等。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需要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去干,才会具有模样。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的故事,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

为了早日建成大庆油田,石油工人王进喜,在油井发生意外井喷时,率先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来搅拌水泥,被称为“王铁人”;“有一种花儿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这首歌是献给那群隐姓埋名远赴大漠戈壁的“两弹一星”功臣;解放军战士雷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2岁,但他践行的时刻为人民做好事的精神,在今天化为无数青年志愿者的自觉行动;河南省兰考县已经治住了风沙,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县委书记焦裕禄……

(摘自《求是》文/陈 晋)

一些当地干部群众也想借此机会,上门吊唁送礼,帮助将军把养母的丧事办得热闹一点。苏静一谢绝,连一个花圈都不肯让当地领导送过来。就这样,用最简单的仪式,苏静将军办完了养母的后事。

苏静的夫人冯淑芬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20世纪50年代复员在家。60年代有不少类似情况的女同志恢复了工作和待遇,还上调了级别。苏静的老伴也向他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是苏静觉得自己是领导干部,又管理着办理此事的业务部门,如此办事有利用职权之嫌。他劝老伴一切要知足,就不要向党伸手了。

从国务院返回军队后,有人劝苏静说:“你在国务院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应该去找熟悉的首长,安排一个合适的职务。”苏静一笑了之。返回军队后,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找苏静谈话,准备安排他做总参顾问,苏静明确表态说:“名誉职务就不要了。”

“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要做工作中的急先锋,荣誉前的大逃兵。”苏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丢手绢》:诞生于延安保育院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这是一段自带“背景音乐”的文字,您看到时是不是也会轻轻哼唱?《丢手绢》,几乎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儿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诞生于七十多年前的延安保育院。

1935年至1948年,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老一革革命家在陕北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那时的延安,是烽火硝烟中的革命圣地,澎湃的革命激情之中,也流淌着《丢手绢》这样的童真和欢乐。

这是革命年代延安娃的童年欢乐,延安保育院就是他们成长的摇篮。

延安保育院是当时设立在延安的儿童保育院、托儿所的统称。据不完全统计,延安保育院在十余年间养育了5000多名孩子,大多数都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才。

“天毛毛(蒙蒙)亮,这一长列五十孔石窑洞的大院落,就显得十分喧闹——孩子们醒来了。刚敲过起床钟,阿姨们都赶来给他们穿衣服。当阿姨们挨近床边时,她们应接不暇地握着很多的小手——在我们这里,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保育员鲍倪这样记录第一保育院的清晨,字里行间流露着温暖和欢快。这样“萌化了”的场景,正是保育院的日常。

文章发表在1945年4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一切为了孩子”。从第一保育院到中央托儿所,到第二保育院,都把这句话奉为誓言、信仰,也真的把这句话变成了每一天的每一件事。

鲍倪就是儿歌《丢手绢》的词作者。她1939年来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在保育员中,鲍倪文化水平较高,当上了第一保育院的文化教员和保教科长。

丢手绢就是那时孩子们常玩的游戏,但是还没有儿歌,一般是阿姨带着孩子们拍手。能歌善舞的鲍倪就编了几句简明、童真的歌词,伴着节奏唱出来。孩子们一学就会,很快就流传开来。

孩子们的歌声偶然被作曲家关鹤岩听到,甚觉得趣,给《丢手绢》谱了曲,旋律变得更加朗朗上口。从此,《丢手绢》成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摘自《北京日报》文/董少东)

粮票:一代人的记忆

■ 王奕君

粮票,曾经作为“第二种货币”,在上世纪50至90年代物资匮乏的时期,计划供应、统一调配着老百姓的饮食之需。

粮票是一种购粮凭证,在全国2500多个市县乃至一些小镇,大面积全方位地覆盖了人们的生活,数量和种类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以地域分,有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之区别。以面额分,有壹市两、貳市两、伍市两、壹市斤、貳市斤、伍市斤、拾市斤等很多种。

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粮票的发放有着严格的标准,儿童的粮食供应量是每月6斤半,一般成年人每月30斤左右。那时,几乎家家都有杆秤,每顿饭都要“称”着吃,如不精打细算,就会饿肚子。

在那个年代,粮店要算是最繁忙最热闹的场所了。每到周末或月底,粮店门前便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大家手里攥着面额不一的粮票,如同攥着自己和全家人的身家性命一样。

那时候,“粮油供应证”更是一个宝贝,手持一本红色或蓝色的粮油供应证,找工作或找对象都占优势。农村人没有粮油供应证,进了城便是“黑户”。那时的城里人找对象,如果找了个农村人,其代价就是自己的口粮直接被夺走了一半。

在那些流通票证的记忆中,也少不了一些丢票证、画票证的政治往事。有人描述过这样的场景:某家粮店在排队买粮的队伍中,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突然惊慌地四处翻找,刚刚还放在兜里的20斤粮票没了。孩子脸都吓白了,20斤粮票可是一家人好多天的口粮啊!粮店的工作人员征求大家意见,随后关了大门,一齐帮忙翻找。如果找不到,他们就打算叫派出所的民警过来了,此时,有个人站出来,说他捡到了。没人追究他是捡的还是偷的,眼看孩子的粮票被还了回来,大家总算长出了一口气。

在电视剧《娘要嫁人》中,张鲁一扮演了一个为爱倾尽全力的痴情男,他的恋人年轻守寡,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他宁愿铤而走险,精心绘制票证为她们一家人“改善生活”,而他自己却被人告发,在充满喜庆和希望的大年三十,被公安机关带走,美好的情路就这样被拦腰截断……

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直到1993年,全国通用粮票退出了人们的生活,我们彻底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迎来了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当我们走在琳琅满目的商业街、走进富丽堂皇的大饭店时,终于迎来了可以自己控制钱袋、可以任意满足味蕾的新生活。

清廉朴素 将军风范

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海澄镇内溪村碑头社,苏静将军的故居静静矗立。简陋的四房一厅内,除了东北房间放着一张苏静当年睡过的木制老床和一个老木柜,其他房间内空空荡荡,没有一件值钱的用具。

苏静将军在世时,当地政府曾多次建议修缮将军故居,但每次都被他严词拒绝。这方故居,犹如一位沧桑的老者,诉说着这位开国中将的清廉朴素。

生活俭朴 淡泊名利

苏静,这位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辽沈战役中的智多星、北平和谈中与傅作义方面签署《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书》的解放军代表,立下了卓越战功的开国中将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始终保持一名共产党员清廉朴素的本色,一生淡泊名利。

新中国成立后,苏静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

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身居高位,苏静却长期居住在北京西四一个老旧的四合院里。刚搬进去时,房间不少窗户还是纸糊的,一半的房子没有暖气。一到冬天,一家人就要挤到有暖气的三间北房里。计委的同志看到苏静的住房条件简陋,几次以安全为由,提出要另找一套新的四合院,可苏静坚决不同意。

1952年中央军委成立军务部,苏静担任军务部部长。当时国家从苏联进口了一批“吉姆”车,配发给领导干部使用。军务部刚好负责这批车的分配。苏静主动对工作人员说,给他随便找一辆车就可以了。其原秘书葛志刚回忆道:“后来苏部长用的是一辆从香港买来的二手车,是深绿浅绿两种颜色。当时我们觉得应该配相应级别的车,建议换一辆。部长笑笑说,不用了,我看挺好,一眼就能看得到,开会出来也好找。”

警卫员陈伟跟随苏静多年,在他的

记忆中,首长生活简朴,吃饭非常简单,“大多时候中午一碗面条,晚上一碗稀饭,从不挑剔饭菜,做什么就吃什么,从没有意见”。让陈伟印象深刻的是,首长很注意节约,他时常看到首长在深夜亲自去关掉院子里的灯,把还在滴水的水龙头再三拧紧。有一次,陈伟看见首长自己修理漏水的坐厕,他赶紧跑过去,蹲在首长身边嘀咕了一句:“水费又不贵,明天请人来修吧!”正在忙活修理的苏静抬起头,一字一句道:“我们没有浪费资源的权利啊!”

张怀德当时是苏静的司机。他的习惯是听见首长车门关上的声音后,就径直开出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有一次苏静去开会,临上车时想起一些文件忘记带了,就把打开的车门一关,转身去取。张怀德听见关门声,以为首长上车了,径直开到会场。回头一看,车里没人,急忙往回开。走到半路,看到首长抱着文件包走得满头大汗,张怀德尴尬得

了解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个“好制度”伴随民族求索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一路走来,在长期实践中得到持续巩固、发展和完善,展现出蓬勃生机和巨大优势。

沿着这条时间线,去深入了解一下“好制度”的探索建立历程吧!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我们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定下基调。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大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这两次大会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

度政体的演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政权建设的开端,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即在各级参议员和政权机关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成为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

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以“人民代表大会”命名的最高层次的地方权力机构,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明确安排,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健全党和国家制度提出了很多好的政策主张。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82年11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会议于12月4日通过了现行宪法,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2005年5月,党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工作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按照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强调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定不移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来源:求是网)